

 搜索

学科重点

- ▲ 世界经济研究
- ▲ 中国国际地位报告
- ▲ 经济强国研究
- ▲ 新开放观研究

权威报告

- ◆ 国际组织
- ◆ 中国政府
- ◆ 各国政府
- ◆ 研究机构
- ◆ 专家报告

学科资源

- ▶ 科研成果
- ▶ 承担课题
- ▶ 学术活动
- ▶ 获奖情况

站点工具

- 联系我们
- 关于网站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转轨国家外贸改革的路径选择

作者:米军 时间:2005-5-23 16:41:02 阅读:378

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无法抗拒的时代潮流。在这股浪潮席卷整个世界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其外,不同类型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以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既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又要规避一定的风险。然而,考察与研究经济全球化与经济转轨国家这类特殊群体的经济发展关系及其贸易改革的联动效应问题,对于像我国这样的经济转轨国家顺畅融入全球化进程会大有裨益。

一 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贸易改革的联动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着巨大变化,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规模扩大,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深入地展开,特别是区域经济贸易一体化的发展,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倾向更加明显。这就要求包括经济转轨国家在内的不同国家参与全球分工协作,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大势所趋。转轨国家贸易制度改革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全球化联动关系和传导机制的作用非常明显。

(一)转轨国家的贸易制度改革必须符合世界贸易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转轨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尽可能地打破这些国家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开放政策。俄罗斯、乌克兰和匈牙利等一些东欧国家纷纷全面实行对外经贸自由化政策。一是取消了外贸经营权的国家垄断,允许境内的一切企业自由从事对外经贸活动;二是开放国内市场,放宽或基本取消进出口限制,实行进出口贸易的自由化;三是逐步取消对国际收支方面的一些限制。中国采取了由局部到全局的贸易开放政策和制度,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快了贸易改革的步伐,经过15年的努力在21世纪初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二)不同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贸易一体化进程,转轨国家也不例外。没有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国家的参与,经济全球化实际上还不



投稿注册

用户
 密码



管理登陆

用户
 密码



友情链接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
- 华师大商学院金融系
- 国研网
- 中国经济信息网
-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 中评网
-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
- 联合国贸发会议
- 世界银行
- 美国经济研究局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亚洲开发银行

具备全球意义。正是由于转轨国家不断扩大对外经济贸易联系，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加速了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对经济全球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转轨国家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影响作用还是有限的。因为参与贸易自由化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商品的竞争力、合理的商品出口结构、与世界接轨的对外贸易政策等，大多数经济转轨国家并不完全具备。首先，商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商品普遍缺乏竞争力。例如，俄出口到国外的产品主要以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原材料和半成品为主，成品出口的比重很小。其次，转轨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不稳定，缺乏连续性，与世界不接轨。实践证明，适应国际惯例和符合本国实际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保证。

(三)加强了各国、各地区经济的紧密联系，转轨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发展成为一种不可逆转和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但也面临着无法回避的风险，特别是转轨国家的国家经济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不可否认，贸易自由化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果(如加强了竞争、强化了分工并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外部经济效应等)。但是，面对全球范围的贸易竞争，对转轨国家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二 经济转轨国家外贸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中国外贸改革的发展路径。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类似，我国的对外贸易改革走了一条步步推进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先沿海再向内地梯次推进，顺应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也加快了调整与改革的步伐。这主要表现在：

1. 20世纪80年代，我国主要是从创办经济特区开始，发展到沿海港口城市的开发和开放，再到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到90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外向型工业园区(浦东新区、洋浦经济开放区、苏州工业园区)，并且适时调整外经贸政策，将我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到沿江地带以至内陆省会城市和地区，形成了从东部到中部、西部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在外贸领域实行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平衡型贸易发展战略。在进口替代方面，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对一般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实行进口替代；90年代发展为对高级工业品、中间产品实行进口替代。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放宽对进口的限制，允许和放宽了跨国公司投资产业领域，标志着进口替代战略的结束。从80年代开始我国同时也在推行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实施出口优惠信贷和出口退税(1985年)等政策大力发展出口贸易。80年代我国对一般贸易基本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直到进入90年代才对一般贸易放松了管制(如调

减进口关税、减少进口许可证管理商品的品种、取消出口企业外汇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取消进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的指令性计划等)。而对加工贸易从开放以来一直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这大大加快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资料显示,从1996年以来,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占我国出口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5%左右。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对促进我国融入国际分工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贸易投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推进。为了抓住这次浪潮给我国带来的机遇,我国加大了对外贸易领域的改革力度。

关税、配额等措施的改革。加快关税下调的步伐,平均关税税率由1995年12月的35.3%下调到1996年4月的23%,1997年10月为17%,1999年1月为16.8%,2001年1月为15.3%,2002年1月为12%,2003年11月为11.5%,并承诺2005年1月平均关税税率为10%。在整体关税降低的同时,原材料、中间产品关税的下调幅度相对较大,以提高对我国产品的实际保护率。不断缩小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范围,到2003年起管理的商品已经减少到8种,而且管理日趋规范,透明度不断增强。

鼓励跨国公司的进入,放宽外资投资的产业领域(大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由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的试探性投资进入到扩张性投资),鼓励国内外企业在国内市场平等竞争,全面提升我国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近年来服务业已约占跨国投资总量60%的份额。但中国对服务业投资的开放度很小,因此,跨国服务业投资进入中国的份额也很小,影响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额。

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进一步加大对外贸易的开放力度。1997年首批中外合资外贸公司诞生,这是我国外贸体制的又一次重大改革,表明我国努力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加大开放力度。

在外汇管理体制方面,早在1979年我国就进行了初步改革。开始实行外汇留成制度。为了满足企业之间外汇余缺调剂的需要,从1980年起,还开始了外汇调剂业务。但是直到1994年,我国才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对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实行并轨,建立起以市场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此后,对境内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买卖外汇纳入了银行结售汇。1996年12月,我国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对于人民币资本项目,正如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局长郭树清所指出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水到渠成的过程。”国外学者研究认为,中国资本账

户开放的步伐应与银行体系的重组以及汇率体制的调整以适应更开放的金融环境相一致。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也表明，如果在国内银行和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开放资本账户，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总之，这种渐进式的对外经济贸易的开放和分工调整，使得开放部门和改革部门获得较大利益，而这又促进了我国在对外经济和贸易领域实行更大范围的开放，从而我国对外经贸表现出了由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发展到以诱致性制度创新为主的发展路径。尤其是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开始提速，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深入发展。加入WTO后的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着质的变化，即由主动开放向被动开放转变，由政策性开放向体制性开放转变②。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外贸体制也必须要有质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建立既适应WTO规定的规则和运作机制的要求，又适应我国国情特点的外贸体制环境。

(二)俄罗斯外贸改革的路径选择。俄罗斯对外经贸制度改革走的是“先开放后学习再调整”的路径。开放伊始就采用“休克疗法”，直接将外经外贸领域暴露于市场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全面实行对外经贸自由化政策，后来由于冲击太大，在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使用上几度调整，即使是当前的外贸体制也仍处在变动之中。至今，外贸制度以及法规建设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俄在维护自身外贸利益与“入世”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抉择。这主要表现在：

1.1991年俄颁布首批法令即废除外贸国家垄断经营制度，减少行政干预，授予企业经营外贸业务的权利和义务，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随之就对从事外贸的企业实行私有化，推行股份制，组建和发展集团公司，只是到1993年以后才开始管制外贸公司，以遏制外贸领域急速开放的失控局面，但贸易自由化的趋势并未改变。改革以来商品进口到俄已不受配额限制，许可证管理只针对有限的商品，但出于保护国内市场的需要，俄又逐步增加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的种类，如1997年开始对食用酒精和酒的进口实行许可证管理，1998年对彩电、1999年对烟草和工业替代品的进口实行许可证管理。

2.改革和规范关税制度，努力向国际通行的制度靠拢。从1993年起，俄实行新的海关税法，这标志着俄海关制度已开始同国际通行的惯例接轨，1996年通过关税法，2000年又颁布和实施了税法典。目前，俄原有的税收体制已得到根本改造，进一步降低了关税，税制已基本与世界靠拢，但距世界贸易组织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进口方面，实行差额税率，进口税率总体上同改革初相比下调幅度很大。俄为了保护本国商品免受外国商品的冲击，在若干年份平均进口关税的税率会略有提高(目前平均进口关税为15%，这离西方国家所要求的6%—7%即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还相差甚远)。同时在进口商品的质量和方面加强了管理。出口方面，迅速减少和取消关税和数量

限制，同时在财政和金融上给予支持。从1992年起俄就较大幅度地调低了出口商品的税率，不断减少征税商品的种类，到1996年俄试图完全取消出口关税，但在2000年后又开始对石油等重要产品征收出口调节税。到1994年俄除出口量自动限制的商品和一些特殊类出口商品外，全部取消了出口限额和许可证制度。为鼓励俄向非独联体国家出口商品，从1993年起对出口企业的产品免收增值税和消费税^②，1996年对出口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可见，俄正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且这个方向至今没有改变，但出于保护国内生产者和产品的竞争力，俄又在反复调整外贸政策和措施。

3.服务贸易方面。由于国内对服务业需求不足和政府支持不够(如信息服务)以及对某些服务行业的种种限制(金融服务)，俄罗斯没有开展大规模的对外服务贸易。目前，俄罗斯服务贸易结构同旧的世界服务贸易结构相类似，信息、金融等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尽管目前服务业的产值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的比重，这并非是因为服务业的发展，而是因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或增长的缓慢。

4.盾际收支自由化方面。按照一般经济规律，当国内贸易和国内金融成功地进行了自由化改革后，才实行汇率的自由化。然而，俄罗斯由于步子迈得过快，在其独立不久的1992年开始了卢布的自由兑换进程，并将其纳入到了“休克疗法”方案中去，这就是所谓的卢布“内部可兑换”制度。这意味着俄已经开放了国内资本市场(但对境外投资者卢布不能自由兑换，如在证券市场上境外投资者出售证券所得收益或投资股票所得的股息都不能用硬通货支付)。结果国家完全失去了对卢布的控制，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为了稳定本国汇率，1995年俄由“内部可兑换”走向了有管理的“汇率走廊制”，1998年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使俄宣布实行浮动汇率。

三 两种转轨路径下的绩效与问题

(一)体制的转换效应问题。目前，转轨国家贸易自由化的水平都显著提高。但是，中俄两国的体制转换效应是不同的。

1.俄罗斯的外贸改革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迅速建立起新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元化共同发展的市场型外贸体制框架。一个产权清晰、责权明确、外贸机构股份化、商业化、企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经营机制已经建立。但俄罗斯快速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给外贸和产业部门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如一些民族工业被挤垮，甚至贸易结构发展“边缘化”有增强的趋势。

2. 经过20多年的外贸制度改革，中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机制正在逐步形成；行政干预力度正在逐步减弱；外贸宏观调控体系日益国际化。这种渐进式的开放和分工调整，有力地 将风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抵御了突发性的外部冲击，保证了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但同时也伴随着高昂的学习成本和调整成本(如资源配置的扭曲、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开放部门和保护部门的利益冲突)；时至今日，外贸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仍以国有外贸公司占主导地位，这非常不利于竞争局面的形成，因而整个外贸工作的经济效益还是很低的。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外贸管理体制还需要制度创新。

总之，转轨国家的外贸体制距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如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就是到2005年关税水平也只承诺降到10%。外汇体制已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但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各种条件还没成熟，转轨国家汇率自由化问题还没根本解决)。

(二)服务业贸易开放问题。中国服务业贸易所占份额较低，缘于我国对服务业的开放度较小。中国拥有巨大的服务业市场，但中国的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例如，1998年中国人均GDP按官方汇价计算达到1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达到3320美元，但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只相当于国际经验数值人均70美元的水平。中国的服务业还具有较高的行政性垄断，这主要包括进入限制、退出限制、经营范围的限制、价格管制、歧视性的政府采购等。如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占国内银行总资产的90%，拥有高度的垄断性；部门、地区、行业保护主义问题还较为严重。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至中国加入WTO后，跨国服务业投资进入的份额都很小。中国迫切需要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这将有利于这些行业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水平。为防止受到来自外部的较大冲击，需要采取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方式。俄罗斯服务贸易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如在1998年世界贸易中，进口业务的67%是无形服务的进口，而俄这一比重仅为25%—30%。俄罗斯服务贸易的世界地位，不如其商品贸易的世界地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测算，1998年，在世界无形贸易总额中，俄仅占出口额的1%，进口额的1.4%，这个总量还不到其GDP占世界GDP总量比重的一半。在存在种种限制的情况下，俄只是部分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国资本进入服务贸易领域的时间和规模保留一定的限制，加之某些服务贸易国内需求不足(如具有潜力的尖端技术商业服务领域私人资本不愿投资)和国内供给能力的限制(资金不足、服务水平和人员素质低)，俄服务贸易在艰难中行进，发展并不乐观。特别是公共服务业(如银行、保险、证券业)中的很多行业同国外相比有很大差距，这主要是由于长期缺乏竞争和投资环境差造成的。即使俄罗斯加入WTO后，这些影响因素也不可能立即得到消除。

(三)外贸市场化与政府职能定位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包括外贸企业向股份制转化,创汇已不再是企业的首要目标,追求高效益、高利润、低风险成为企业的主要目标。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日益减少。但在外贸领域政府职能的转变依然尚未完成,这表现在:宏观管理还没有转到以经济、法律手段为主上来;对进口行政性管理过多、过严。国家对外贸运行的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完善(如与世界贸易组织接轨的法律法规需要健全和完善),特别是汇率、关税改革还没有到位。中国市场化的外贸制度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我们需要在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有限的政府干预,根据产业与贸易发展的特点适时采取战略性贸易政策支持。政府在进行必要的行政管理的同时,宏观管理要转移到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为主的轨道上来。同样,俄罗斯过快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和政府迅速退出原来发挥作用的许多领域(包括外贸领域),导致政府职能日趋衰弱,驾驭本国经济的能力下降。其结果是,造成社会经济的混乱和经济转轨步履维艰。所以,在转轨的后期俄大力加强了对外贸领域的调整。并进一步强化政府职能。

(四)贸易自由化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今天,跨国公司依靠其竞争优势(借助其强有力的投资活动和对全球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资源的整合)成为国际贸易合作的主体。由此使得当今的贸易自由化、市场化这把双刃剑更加锋利,在给转轨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安全造成了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它可能垄断转轨国家的一些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甚至使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导权逐步丧失,并可能引发民族工业的生存危机。

1.俄罗斯东欧一些转轨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由于疏于防范或产业贸易战略政策实施不当,一些民族工业被挤垮,贸易利益相对受损增大,甚至经济发展“边缘化”有增强的趋势。例如,英国和美国的四大烟草公司只用2—3年的时间就完全占领了俄罗斯的烟草市场,俄自己的大多数企业则被这四大烟草公司挤垮。另外,俄经济原材料化的倾向不仅较为严重,而且今后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与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出口的是低附加值的原料性资源产品,进口的是高附加值的机械设备、高技术产品。这种商品贸易结构从国际交换比价来看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尽管这个贸易结构对俄极为不利,但俄罗斯又别无选择。在其他转轨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2.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近年来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市场地位不断上升,在一些行业凭借其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这些也正是我们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所看中的)不断构筑起较高的行业进入壁垒,以获取较高的垄断利润。例如,在我国的软饮料行业、移动通信行业、化工、医药、批发零售服务等行业跨国公司或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或已基本垄断该行业。例如,可口可乐基本垄断了我国大中城市的饮料市场,在感光材料行业柯达2003年10月收购了乐凯20%的国有股,全面控制我国的数码冲印市

场。所以，制定和颁布反垄断立法已成为目前和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保障我国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需要。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以及外贸改革的联动关系的作用更加明显。为此，转轨国家选择了不同模式试图融入全球化贸易一体化的循环中。以中俄为代表的转轨国家分别用不同的方式启动外贸改革，走出了不同的改革道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俄两国都面临着完善市场导向型的贸易发展模式。实践证明，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转轨国家幼稚产业成长以及竞争优势能力的培养需要一个稳健的对外开放环境，而且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尤其是服务贸易自由化中最为敏感的问题是国家安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在国家利益、安全利益与服务贸易利益之间的权衡和选择。经济转轨国家不能回避服务业的开放，但服务贸易自由化应逐步进行以保证这些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自主性。这就需要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既要顺应潮流采取诸如进一步降低关税、削减计划限制并保持贸易政策的透明统一等措施对贸易政策进行调整，推进本国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同时要在WTO框架允许范围内，适当采取保护性措施，进一步落实海外市场多元化战略的策略和办法。为与经济全球化下的新的贸易自由化总体趋势相适应，应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贸易体制改革，加快与国际接轨。

来源：《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5年第2期（原载《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

2005-04-05

[返回](#)

版权申明 免责条款 隐私保护
2005年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版权所有